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组编

中国教育科学

Education Sciences in China

2015年
第1辑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科学

ZHONGGUO JIAOYU KEXUE

2015年

第1辑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组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科学. 2015 年. 第 1 辑 /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
分会组编.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107-23018-9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教育科学—中国—文集
IV. ①G4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8061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 092 毫米 1/16 印张: 14.5 字数: 314 千字

定价: 30.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 100081)

2013 年创办

每 年 四 辑

封面题字

顾明远

主 编

郭 戈

副主编

刘立德

石筠歆

编辑部主任

韩华球

英文编辑

付 蕾

执行编辑

李 冰

封面设计

于 艳

联系电话

010-58758980

传真

010-58758991

电子邮箱

zgjyxx@pep.com.cn

邮编地址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回顾大家

吕 达 我国课程论奠基人陈侠先生的教育学术贡献
刘立德
——纪念陈侠先生诞辰 100 周年/3

杨汉麟 学者本色 大师风范
——任钟印先生生平及教育学术贡献/33

教育学原理

檀传宝 美学是未来的教育学
——兼论现代教育的审美救赎/49

程 亮 “教育学史”: 概念与维度/71

课程教学论

李瑾瑜 教育的儿童观基础及其现实问题反思/91

杨九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教学变革论叙/113

学术感悟

张铁道 探索教师研修 20 年/131

学科教育学

周正逵 语文教改五大疑难问题新解/149

教育史

肖 朗 詹姆斯·穆勒功利主义教育思想述评
——以其代表作《教育论》的文本分析为中心/177

周洪宇 牧口常三郎创价教育思想之研究/197
蔡幸福

2013 年创办

每 年 四 辑

封面题字

顾明远

主 编

郭 戈

副主编

刘立德

石筠波

编辑部主任

韩华球

英文编辑

付 蕾

执行编辑

李 冰

封面设计

于 艳

联系电话

010-58758980

传真

010-58758991

电子邮箱

zgjyxx@pep.com.cn

邮编地址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回顾大家

吕 达 我国课程论奠基人陈侠先生的教育学术贡献
刘立德
——纪念陈侠先生诞辰 100 周年/3

杨汉麟 学者本色 大师风范
——任钟印先生生平及教育学术贡献/33

教育学原理

檀传宝 美学是未来的教育学
——兼论现代教育的审美救赎/49

程 亮 “教育学史”: 概念与维度/71

课程教学论

李瑾瑜 教育的儿童观基础及其现实问题反思/91

杨九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教学变革论叙/113

学术感悟

张铁道 探索教师研修 20 年/131

学科教育学

周正逵 语文教改五大疑难问题新解/149

教育史

肖 朗 詹姆斯·穆勒功利主义教育思想述评
——以其代表作《教育论》的文本分析为中心/177

周洪宇 牧口常三郎创价教育思想之研究/197
蔡幸福



吕达 1944 年生于山东。上海师范大学本科毕业 (1966)、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 (1981)、博士 (1988)。1981 年起, 历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副编审、编审, 课程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 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 兼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基础教育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会理事长暨课程学术委员会理事长、博士生导师、《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主编等职。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并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主持或参与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至“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多项。主要著作有《课程史论》(专著)、《课程概论》(主撰)、《独木桥? 阳关道? ——未来中小学课程面面观》(主撰)、《教育大辞典·课程与教学分册》(副主编)、《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教材与教学论负责人)、《英汉教育大词典》(主编)、《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主编)、《杜威教育文集》(主编)、《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副主编)、《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副总主编) 等。



刘立德 1965 年生, 河南永城人。1984 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 先后获得教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1 年至今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现任教育编辑室主任、编审。兼任课程教材研究所教师教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主任、研究员,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等职。主编或合作编著有《中国教育史纲要》、《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中国近代教育史》、《课程概论》、《杜威教育文集》、《舒新城教育论著选》等。在《课程·教材·教法》等期刊发表论文 20 多篇。

《我国课程论奠基人陈侠先生的教育学术贡献》导读

- | | | | |
|------------------------------------|------|--------------------------------------|------|
| • 陈侠先生生平简介 | (4) | 的工作“母机” | (14) |
| • 我国课程论学科的卓越奠基人 | (5) | 洋为中用——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 (18) |
| • 在相关领域的辛勤耕耘及其成就为课程论的重建奠定了基石 | (11) | • 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 教育科学理论的热心传播者 | (23) |
| 课程史——昨天、今天与明天 | (11) | • 风范长存: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 (28) |
| 教学论——与课程论相辅相成 | (12) | | |
| 一生心系师范教育——紧紧围绕整个教育 | | | |

【编者按】陈侠先生系我国现代著名课程学家、教育学家和编辑出版家。这位课程论学科一代宗师，曾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编辑室主任、《课程·教材·教法》编委会副主任兼副主编、课程研究室负责人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常务学术委员等职，也是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前身全国教育学会研究会的主要创办人和卓越领导人之一。2015年2月6日是陈侠先生诞辰100周年。为使读者全面了解陈侠先生在课程论等领域的丰功伟绩，本刊特发表吕达、刘立德撰写的《我国课程论奠基人陈侠先生的教育学术贡献》一文，以资缅怀和纪念。

我国课程论奠基人陈侠先生的教育学术贡献

——纪念陈侠先生诞辰100周年

吕 达 刘立德

【摘要】陈侠先生对我国课程论重建的先驱性奠基性贡献，可以归纳为五个“第一”：撰写了我国第一部《课程论》专著；在我国新时代《教育大辞典》中第一次主持撰写了课程和各科教学分卷；在多所高校开讲课程论他是第一人；参与创办并主持执编了我国第一本课程专业期刊《课程·教材·教法》；主编了我国第一套《课程研究丛书》。他在课程史、教学论、师范教育、外国教育（比较教育）等相关领域的辛勤耕耘和丰硕成果，为课程论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石。陈侠先生的教育学术贡献还突出地表现在，他是全国教育学会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和首任秘书长，改革开放初期即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并主编出版了《论教育的本质和职能》等教育学论文集12卷，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立下了汗马功劳。

【关键词】陈侠；课程论；奠基；教育学术；贡献

陈侠（1915—1992），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我国

现代著名课程学家、教育学家和编辑出版家。这位课程论一代宗师，不仅在人教社主持编辑出版了大批有重要影响的师范教材和教育图书，执编教育期刊，而且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教育科学研究，撰写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陈侠先生不愧是研究型、专家型编辑的典范。叶圣陶先生称他为“认真研究教育的有心人”。他的教育学术成果，极大地充实、丰富了中国教育科学宝库。缅怀他为我国教育科学研究、为教育出版事业、为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他为建构中国课程论体系和教育学体系而努力作出的业绩，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陈侠先生生平简介

陈侠，字谊正，1915年2月6日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27年小学毕业。1933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师范科，同年起先后任江苏省立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小学教员、江苏省立界首乡村师范学校教员兼附属小学主任（相当于校长）、江苏省立扬州实验小学低级部主任、江苏省立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乡村教育》杂志编辑。当时，扬中附小的教师组织“初等教育研究社”，刊发《初等教育通讯周刊》，1934年印行《初等教育研究集》（第一辑）。这本文集作者一共25名，陈侠与朱智贤、沈百英等人一起跻身其中。陈侠从做小学教师开始，一直坚持写心得，坚持教学科研一致的原则，这对他最终成为成就卓著的教育专家起到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侠入内迁到西北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后更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学习；1942年毕业，留校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研究所助教，并师从著名教育家李建勋读研究生。1947年晋升讲师。翌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曾兼任该校附小校长，历任该校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及甘肃《地方教育辅导丛刊》编辑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陈侠于1950年调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任编辑。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转入本社工作，历任教育室（原名编审部教育组）编辑、副主任、主任、编审，《教育译报》副主编。“文革”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解散，全体人员“下放”到安徽凤阳农村去劳动，五十出头的陈侠也和大家一样，在那里种地、养猪、盖房。“四人帮”被粉碎后，陈侠又回到人教社工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他虽已年过花甲，却以高昂的热情投入编辑出版工作和教育科研工作。1979年，他参与发起全国教育学会，任首届常务理事兼秘书长。1980年参与创立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室（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前身），任研究员。1981年，参与创办《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任副主编，并主持日常编务工作（当时该刊还没有单独的编辑部）。1983年6月10日，教育部党组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教社合署办公，即一套机构，两块牌子；7月20日，邓小平为研究所题

写所名。陈侠任该所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学术委员会中多为全国知名的各学科翘楚，其中包括武永兴、张志公、刘国正（刘征）、苏寿桐、雷树人、陈尔寿、王占春等。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后，原课程教材研究室改建为课程研究室，以研究课程理论为主，由陈侠负责；教材研究任务则由各学科编辑室承担。鉴于陈侠在教育学术上的造诣，他还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学分支学科副主编，河北大学、西北师大等7所高校兼职教授，《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兼《课程和各科教学》分册主编，并当选民盟人教支部负责人、民盟北京市委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参政议政殚精竭虑。1986年办理退休手续，但他退而不休，仍一如既往地积极主动承担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及其他方面的许多编辑工作和研究工作，直至1992年病逝。

陈侠毕生在教育战线尤其是教育出版战线辛勤耕耘。在漫长岁月里，他几十年如一日，一方面兢兢业业地投身教育教学的实际工作，并从事师范院校教材和教育书刊的编辑工作；另一方面，执着地潜心于教育科学研究，发表、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教育著述。

中青年时代的陈侠就有大量论著问世，例如：《建国的儿童训练法》、^①《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②《国民学校教学实际问题》、^③《国民学校教学之改进》等等^④。这些著述都是作者结合本职工作撰写出来的，几乎涉及中小学教育的各个方面，诸如教材教法、班主任工作、学校行政、家庭教育、学校与社会的联系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陈侠先生著述成果更加丰硕，除了大量教育学术译著外，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后结集出版了《论教育规律及其他》、^⑤《师范教育和教育科学》等^⑥。他还主持选编了两部著名教育家文集（一是《李建勋教育论著选》，一是《傅葆琛教育论著选》）。而最为著称于世、影响深远的传世之作无疑是《课程论》^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完整的课程论专著。

二、我国课程论学科的卓越奠基人

课程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却只有一个简短的历史。美国学者博比特（F. Bobbitt）

① 正中书局1941年版。

② 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③ 大东书局1946年版。

④ 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⑤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⑥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⑦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918年出版《课程》这本专著，标志课程论雏形诞生。在上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课程论这门学科也曾昙花一现，既有翻译引进的外国课程论著，也有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课程史和课程论著述。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体和政体的原因，也由于一边倒、学苏联的最高决策，我国的教育学和苏联的教育学一样，从宏观结构看，里面没有关于课程的篇章，只有“教学内容”的章节。“教学内容”章节只是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做简略介绍，以便基层教育实际工作者知道并照办，因为苏联和当时我国都认为，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研究和编订是国家的事情、中央的事情，都把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作为国家的指令性文件来颁布，而且全国只有一种教科书，教育实际工作者只要照办就行了，他们无须了解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是怎样制订的，教科书是怎样编写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这一系列改革，既有对“文革”十年动乱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也有对“文革”前十七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剖析，包括对一边倒、学苏联的历史反思。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聚居，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很大，很不平衡。教育事业也是如此。改革就是既要有中央的积极性，又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和学校的积极性。赋予地方和学校更大的自主权，也就是他们要承担比以往更大的责任。为了适应“很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既要有国家统一的基本要求，又要引导、鼓励和提倡各地区各学校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就课程教材而言，单有国家课程、单有一套教材远不能适应各地各学校的要求，地方课程、学校课程（校本课程）的研究和开发呼之欲出，“一纲多本”的教材也势在必行。这样，开发课程的人会越来越多，编写教材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他们需要课程理论知识。各地教育行政工作者和广大教师也需要课程理论知识，需要懂得什么是课程；课程在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意义、价值是什么；课程应该怎样编订；课程应具有什么样的整体结构和具体结构才有利于教书育人、立德树人；课程内容应该怎样选择和组织，才是科学的、合理的、可行的；课程应怎样实施才能减负增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课程应怎样管理才能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课程应怎样评价才能促进教与学，等等。不懂得课程，就不可能自觉地、准确地执行课程计划（教学计划）和各科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更不可能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发课程，也不可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选择和使用适合自身情况的教材，以提高教学质量。

陈侠先生正是较早地认识到社会的转型，看到了新时期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较早地把视线聚焦到学校的核心问题——课程。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当教育结构（即各级各类教育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基本解决后，教育改革必须也必然深化到学

校课程领域。课程改革是整体改革，而不是单打一的改革。课程是学校培养未来人才的蓝图。今天学校的课程，就是明天的人才，就是后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愿景。在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上，显然，以往以教学（论）等同或代替或涵盖课程（论）的理论已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行不通了。美国学者赛勒（J. G. Saylor）曾用三个比喻来解释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课程好像施工的蓝图，教学则是施工的过程；课程好像演奏的乐谱，教学则是演奏的过程；课程好像球赛的方案，教学则是球赛的过程。比喻当然不可能完全准确或确切，但是的确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和思索。在笔者看来，在解决了为什么教、为什么学的问题的前提下，课程（论）主要解决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教材（论）主要解决用什么教、用什么学的问题，教学（论）主要解决怎么样教、怎么样学以及教得怎么样、学得怎么样的问题。课程、教材、教学，三者既密切相关，又不能完全等同。（当然，广义的课程，可以包括它的载体——教材。）

众所周知，就全国而言，我国到上世纪80年代中已编订了7套中小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正在此时，我国教育改革迈入了一个重要转折点：1985年，改革开放后第一种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1986年，我国决定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6年教育部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下设各科教材审查委员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界标，在我国中小学课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材由编、审合一走向编、审分开，由国定制走向审定制，由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也就是说，在国家统一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中小学教材实行多样化。需要强调的是，这是我国中小学教材“制度”的重大变革。（这里要澄清两点。一是，此前我国中小学教材也曾有过多样化，而且人教版教材也有过多样化，既有面向大部分地区的教材，也有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实验教材，但国家的教材制度尚未改变。二是，我国中小学教材实行多样化的制度，实由此肇始，当时有所谓八套半之说，而非源于后来的新课改。）教材制度的变革，既与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密切相关，又直接影响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个事件，均早于1986年这个时间节点。其一，1983年，我国首家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而在此之前几年，即198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即已设立了课程教材研究室，是为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前身或雏形。其二，198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筹备《课程·教材·教法》杂志。该刊1981年正式创刊，初为丛刊，一年四辑，相当于季刊。该刊是我国第一种以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教学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性、学术性期刊。该刊甫一创刊，就发表了叶圣陶、戴伯韬、叶立群和陈侠等老一辈教育家有关课程改革的一系列论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先驱者们，以该刊为阵地，最早吹响了我国新时期课程改革的号角。

其三,陈侠先生从1984年就开始为多所高校研究生讲授课程论专题课程,可以说他是改革开放后在我国高校开讲课程论的第一人。后来,课程论这门学科正式进入我国高校课程(学科)计划之中,乃至许多高校陆续设置课程学系或课程与教学系,课程与教学论成为越来越多硕士生、博士生攻读的学科和研究方向,应当说,陈侠先生早期开设的课程论是重要的滥觞,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毫无疑问,上述三个事件并非孤立,也绝非偶然。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革,为我国新时期课程论的重建提出了急迫要求,呼唤课程论在教育体系中占有它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各地中小学课程改革的丰富实践和探索所取得的大量成果,为课程论的重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鲜活的营养。还有一条十分重要,当时先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主要领导的戴伯韬、叶立群等既高瞻远瞩,洞察时局,又甘当伯乐,知人善任,把编写我国第一本课程论的重担交给了陈侠(按:叶圣陶任人教社社长一直到“文革”初,后改任顾问;戴伯韬自1954年由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奉调人教社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后,实际上一直主持人教社工作,并一度是教育部党组成员)。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有这样的眼光、这样的胸怀,从事业出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与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肝胆相照、推心置腹,是非常值得称道,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陈侠先生也不负重托,除了不折不扣做好一系列师范教材和教育书刊的编审工作,保质保量完成挂靠人教社的全国教育学会秘书长的工作任务之外,经过9年的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出色地完成了《课程论》这部专著的撰著任务。

陈侠《课程论》1989年3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而该书的主要学术成果在此前几年中已陆续发表于专业期刊或高校讲坛。《课程论》这本书既是一部自成体系、富有创见的学术专著,又是一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教材,因此可以说是一部专著型的教材。陈侠先生以一己之力独立撰著的这部《课程论》,是新中国第一部课程论专著,也是第一部课程论学科的大学通用教材。这部《课程论》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作者明确把“中国特色”作为目标,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论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结构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本书最鲜明的特点,也是作者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尝试。笔者之一在与陈侠先生多年共事的岁月里,曾不止一次听到陈先生对那些言必称希腊,或数典忘祖的人,表示出的不屑,乃至直言抨击。其二,该书不是空谈理论,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有的放矢,把学校课程编订与教育目标挂钩,分别阐述学校课程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和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中的地位 and 作用,教育目标和课程的性质、任务、类型、编订、实施和评价的关系。其三,该书内容丰富、全面,深入论述了课程论各方面的问题,包括课程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方法,中国和外国学校课程的演变,国外课程理论的各种流派,制约学校课程的各种因素,学校课程的编订和实施,学校课程的评价,学校课程编订的发展趋

势等。其四，特别具有重要价值的是，该书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几十年来学校课程编订和实施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使这些可贵经验理论化、系统化。这对我国今后的课程改革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引领和实践指导意义。该书把我国几十年来在课程的编订和实施中遇到并争论过的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总结概括为应如何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个人全面发展与社会现实需要的关系；传授知识与发展智能的关系；文与道的关系；巩固“双基”与吸收新知的关系；统一要求与适应差异的关系；文科与理科的关系；逻辑系统与心理系统的关系；直线前进与螺旋上升的关系；课内与课外的关系。

综上所述，该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学校课程进行了研究，突出了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对课程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初步确立和奠定了中国课程论学科体系、框架和范式，成为当时和后来课程论的学术研究、课程教学、教材编写的领跑者。该书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我国“课程论”教学和研究水平，它对新中国课程论的重建和发展所建立的筚路蓝缕的开拓奠基之功，是彪炳史册的。同期和此后我国又有一些课程论专著应运而生，陆续出版。课程论研究在我国教育学界渐成热点，甚至一度发展为“显学”。在我国，课程论作为教育学（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地位终于得以重建，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随后又催生了全国性的课程研究学术组织——课程专业委员会（后改名课程学术委员会，隶属于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饮水思源，我们应当铭记陈侠先生对课程论研究的开拓和引领。

陈侠《课程论》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和主要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最宝贵的学术遗产。该书由于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甫一出版两年内即连续两次获得殊荣：出版当年即荣获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奖，1991年又荣获《光明日报》“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课程论》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多次重印，至今仍被一些高校列为教育学科博士、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和教学必读书。

在撰著《课程论》的同时，陈侠还主编了新中国第一套《课程研究丛书》，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教育大辞典》中的第一卷，《课程和各科教学》分册包括在其中。这些学术工作在当时对我国课程论重建的奠基，也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陈侠策划的《课程研究丛书》从1985年开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选题中既有翻译引进的发达国家的课程专著，又有我国学者自己的课程专著。译著主要包括：英国著名课程论专家丹尼斯·劳顿等人的《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①，美国著名课程论专家比彻姆的《课程理论》^②，日本著名学者伊藤信隆的《学校理科课程论》^③，苏联教育

① [英] 丹尼斯·劳顿著，张渭城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② [美] 比彻姆著，黄明皖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③ [日] 伊藤信隆著，邢清泉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专家克拉耶夫斯基等人的《普通中等教育内容的理论基础》^①。《教育大辞典·课程和各科教学》的编纂工作，正好同人教社各科教材的编辑工作密切相关，陈先生组织各编辑室人员参与其事，实际上成为人教社一项重要的科研活动，既出了成果，又锻炼提升了人才素质。《教育大辞典》编纂工作从1986年开始，历经数年，1992年分册本陆续出齐，后来又出了修订合编本（上下两卷）。

还应当指出的是，我国课程论重建的奠基工作与《课程·教材·教法》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如前所述，1981年该刊创办后，在戴伯韬、叶立群先后领导下，陈侠既担任副主编，主持编审把关，又在没有独立设置杂志编辑部的情况下兼任杂志日常编务负责人。他一方面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课程论文章，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广大读者和作者交流，以文会友，另一方面广泛联系、吸引、凝聚作者和读者的力量，营造课程改革势在必行的社会舆论，为课程改革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有评论说，这本杂志创刊后发表的一批重头文章，最早吹响了我国新时期课程改革的号角。平心而论，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关于刊名，笔者曾问过陈先生：为什么没有定名为《课程教材研究》？这个刊名不是更高雅更学术，而且也与课程教材研究所（前身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室）更吻合吗？陈先生说，筹备时对刊名的确有过不同的意见，最后决定把“教法”（教学法）放在刊名里，正是为了着眼于教学第一线，面向广大中小学教师和教研员，把他们当作本刊的主要作者和读者群；同时也策励本刊编辑人员时刻牢记理论联系实际的信条，防止和避免脱离实际、空谈理论。这本杂志明确定位、办出特色，越办越大，越做越强，应广大读者和作者的要求，不断扩版，不仅从丛刊（季刊）改为双月刊，又改为月刊，而且加大了开本，增加了印张（从最初4个印张64面，到目前8个印张128面）。该刊被誉为“教师的挚友，教研的助手，教改的参谋”，多次荣获国家级大奖。

概括地说，陈侠先生对我国课程论重建的先驱性、奠基性贡献，可以归纳为五个“第一”：一是撰写了我国第一部《课程论》专著，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课程论论文，既提出了课程论的总体架构、学科体系，又探索了课程论的重点问题、发展方向；二是在新中国第一部《教育大辞典》中主持撰写了课程和各科教学分卷，第一次界定或规范了课程和各科教学的有关内容；三是担任河北大学、辽宁师大、哈尔滨师大、西北师大、华南师大、广西师大、杭州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是在全国高校系统讲授“课程论”的第一人，是为课程论在教育科学中的学科地位得到确立的先河；四是主持执编国内第一本课程专业期刊《课程·教材·教法》，为课程论的重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舆论准备；五是主编我国第一套课程学术丛书《课程研究丛书》，为中国特色的课程理论体系的创建和完善提供了学术支撑。

① [苏联] 克拉耶夫斯基等编著，金世柏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三、在相关领域的辛勤耕耘及其成就为课程论的重建奠定了基石

课程论的重建不是孤立的，没有相关领域的丰富知识、学养、经验和成就，课程论重建的基石就不可能坚实牢固，课程论重建就只能像海市蜃楼、空中楼阁。陈侠先生之所以能在课程论重建上卓有建树和突破，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是，他在相关领域都进行了不倦的持之以恒的研究，具有广博深厚的学识根基，开阔的学术视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为课程论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一）课程史——昨天、今天与明天：让历史告诉未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没有昨天和前天，就不会有今天。昨日之史，是今日之论必不可少的借镜。不了解历史，既可能把老祖宗早已知悉的道理、行之有效的举措，当作自己的新发现、新发明来炫耀，也可能重蹈覆辙，穿新鞋走老路，或者走弯路甚至走错路，而茫然不知。

陈侠早在70年前的1944年就撰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小学课程史专著《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这部专著对近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宗旨及目标、课程演变及特色、课程实施及成效进行了认真总结、概括和分析，并进行了点评。全书共六章。第一章为绪论，论述了课程的意义及地位、课程演变的动力和课程演变的分期。陈侠认为，社会需要的变迁、时代思潮的迁嬗、教育学术的演进、教育宗旨的变更和学校制度的改革是促成课程演变的动力。鉴于此，他不是简单地用政治变迁来套用于课程演变，而是依据教育和课程自身发展逻辑，将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过程分为五个时期：草创时期（1902—1911）；因袭时期（1912—1921）；改造时期（1922—1928）；革新时期（1928—1941）；现行小学课程。第二至六章分别对这五个时期的小学课程进行了阐述。60多年之后，该书入选由著名教育学家瞿葆奎先生领衔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由李臣之重校，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这套丛书试图透过所选收重校的著作，重现20世纪中国教育学者的学术智慧，盘点中国教育科学的世纪历程。其《出版说明》指出：“辑入这套《丛编》的，皆历经了50年以上时间检验的、水平较高、影响较大、领学科风骚的著作。”众所周知，20世纪我国教育图书汗牛充栋，浩如烟海，陈侠这本专著能入选这套丛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历史地位和意义。应该说，陈侠这本课程史著作，为他40多年后的课程论研究铺垫了道路。

无独有偶。也是约40多年后，作为陈先生的团队成员，笔者（吕达）的博士论文题目恰恰是《论我国近代普通中学课程渊源与沿革及其历史经验》。一个小学，一个中学，看似巧合，实属必然。笔者博士论文选题如果在教育史硕士论文基础上延

伸,相对来说应该是顺理成章、驾轻就熟的。但是笔者没有选通常意义上的教育史题目,而是选了课程史与课程论相结合的题目,应该说是同自己所在的岗位——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课程研究室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也是同陈侠先生治学道路的影响密切相关的。

史论结合,据史立论,论从史出。前天和昨天是今天和明天的必由之路。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就是课程史对课程论必不可少的作用。

(二) 教学论——与课程论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

课程(论)与教学(论)的相互关系有四种说法:一是二元论;二是同心圆论(或曰涵盖论:甲涵盖乙,或乙涵盖甲);三是交叉论;四是互动论。尽管笔者采互动论之说,但实际上无论哪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课程(论)与教学(论),谁也离不开谁,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显然,研究课程论,必须也必然关注教学论,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陈侠虽以课程论专家著称于世,但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须臾未曾离开过教学论。

1. 充分发挥儿童的主动性积极性。陈侠早年就有多部教学论专著面世。例如,《建国的儿童训练法》、《国民学校教学实际问题》、《国民学校教学之改进》等。

《国民学校教学实际问题》是一本小学教学论专著。该书对小学教学工作的各个方面作了全面而通俗的阐述,包括编班、选择教科书和教学方法、写教案、排课表、提高儿童学习兴趣、进行个别指导、教育特殊儿童、考试、指导假期作业等30个专题。

在该书中,陈侠十分强调教育教学工作要充分发挥儿童的主动性积极性;要了解儿童、爱护儿童、尊重儿童;要启发诱导,要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引起学习动机;要指导儿童自学和讨论;要根据儿童的特点加强个别指导。全书30个专题中,有关上面这些内容的就有11个专题。他认为:“上课时儿童不让教师进行功课,其咎不在儿童而在教师,因为教师未能准备儿童的心向。”^①“引起或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不仅是教学的手段或技术,同时也是教学的目标或目的。”^②“好问是一个常态儿童应有的特性;儿童知识的增进,经验的生长,除去靠五官四肢直接观察和接触以外,多半要靠发问来听取成人的解答。”“我们处理儿童问题的唯一原则,便是针对其问题,予以适当的解答,并应设法激发其思想,鼓励继续提出新问题。”^③“发问和讨论乃系儿童学习必不可少的活动,所以善于鼓励儿童发问和讨论,乃“是增进教学效率的一种重要技术。”^④

《国民学校教学之改进》是一本各科教材教法专著,论述的学科有国语、算术、常识、社会、劳作、绘画、音乐、体育。《建国的儿童训练法》则是一本有关学校德

①②③④ 陈侠著:《国民学校教学实际问题》,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5、65、69、73页。

育的专著。

2. 兴趣是一切工作的原动力。陈侠1936年在《乡村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乡村儿童兴趣的调查与研究》一文。该文强调兴趣在儿童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中说：“谁都知道，兴趣是一切工作的原动力。没有兴趣而勉强工作，那么这工作便成了苦工。倘若把每一件事都当作苦工来做，其结果不是敷衍塞责，便是草率从事，决不会有优良的成绩。儿童的学习与活动，便是儿童的工作，倘若儿童对于学习与活动根本没有兴趣，而教师还要勉强儿童学习，迫令儿童活动，那么儿童必定也要把学习与活动当作苦工。草率与敷衍固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逃学与规避的事实还有不断发生的可能。”该文用问卷调查的办法调查了869名5—18岁的农村儿童。问卷共提出11个讨论题，如“你最喜欢什么功课？”“你最喜欢做什么游戏？”“你最喜欢学校里的什么人？”“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等。每个问题中都列有若干具体选项，供孩子们填写。对收回来的问卷，逐项进行统计，并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例如“你最喜欢什么功课？”这个问题，有47.41%的儿童填“国语”，居首位。为什么喜欢国语课的儿童这样多呢？作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1）国语书里有许多有趣味的故事；（2）教学国语时常常讲故事；（3）国语教学的时间多；（4）家长或教师重视国语；（5）国语学了有应用的机会；（6）调查的教师是担任国语的。在“你最喜欢做什么游戏？”一问中，填“踢毽子”的儿童最多。这是为什么呢？作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1）儿童对于普遍流行的游戏，大都会玩一两种；（2）含有比赛性质的游戏儿童特别喜欢玩；（3）无需游戏器具或只需极简单的游戏器具的游戏最容易普及；（4）简单易学而变化多的游戏也最容易普及。这些分析是很符合当时乡村教育实际情况的。在对逐个问题分析之后，作者还总起来分析什么事物能够引起儿童的兴趣，怎样才能引起儿童的兴趣，儿童的兴趣为什么会发生差异等。

写这篇文章时，陈侠才21岁。作为一个青年教育工作者，他在从事教育实际工作的同时，能重视这种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借鉴的。

3. 关于惩罚问题的研究。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盛行惩罚甚至体罚的情形，20岁的陈侠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儿童惩罚问题的讨论》^①。文中对当时盛行的“施于可怜弱小的儿童”的“打打骂骂、停止运动、做苦工、坐暗室等种种残酷的刑罚”表示极其愤慨和痛心。他向教师和家长陈述惩罚的危害，呼吁他们不要“再残酷地惩罚儿童”，希望他们“拿出爱护儿童的真心，使用本文所提供的方法来教养儿童。”

4. 关于“全面发展”观点的辨正。“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一个带

^① 本文载于《江苏小学教师半月刊》1935年第3卷第4期。